

廣西出版史志資料

第七輯

廣西新聞出版社
志編輯室編

广西出版史志资料

第七辑

广西新闻出版局

出版志编辑室

一九九二年九月

目 录

编辑出版

- 广西的雕版书..... 陈相因 (1)
民团周刊社与建设书店 胡庆嘉 (31)
试谈抗战时期我党对桂林文化城出版事业
的领导 龙 谦 (43)
简述抗战时期广西出版发行工作光荣传统 龙 谦 (56)
1952-1991 年广西出版大事年表... 梁振珍 陈相因整理 (67)
《农民之友》期刊简介 艾雨春 (98)
编发《新书报》的回顾..... 唐泽玟 (106)

印 刷

- 南宁市人民印刷厂简介..... (108)
梧州地区印刷厂简介..... (112)

发 行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大事记
(1963-1975 年) 朱星辉 陆宝琪整理 (117)

出版行政管理

民国时期广西省政府查禁书刊一览表

(1932—1935年) 胡庆嘉辑 (166)

广西出版行政管理大事记

(1966—1976年) 冯廷杰整理 (267)

广西的雕版书

陈相因

雕版印刷的书籍简称雕版书。根据雕版印书单位性质的不同，又可以将雕版书分为官刻本、坊刻本、家刻本和社团刻本。

早在北宋年间，广西就有了自己雕版印刷的书籍，可是种类和数量都极少，今天还知道的仅为一种；南宋时，广西雕版书的种类及数量有所增加，它的地域分布也由原来的桂州（今桂林）一处发展到柳州、容州（今容县）、象州等一些交通比较便利，经济、文化基础较好的地区。但从现存的历史文献资料看，这时广西的雕版书还限于官刻本，到了明清两朝，广西雕版书才大量涌现。明清时，广西的雕版书除官刻本外，先后有了坊刻本、家刻本和社团刻本，其种类涉及了经、史、子、集、医、农、杂著，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这个时期，广西雕版书的质量有了提高，出现一批开本大方，纸张、用墨讲究，刻工精细的雕版书，甚至在明代还出现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在全国来说也不多见的以靛青代墨的蓝印本。同时，整个刻书活动也日益活跃，几乎遍及广西的府、州、县，就连比较偏远的太平（今崇左）、泗城（今凌云）等地区也雕版印了书；不少地方相继产生了数量不等从事雕版印书专业的刻坊，清代仅桂林一处，现还可考知的刻坊就有 50 余家；并拥有了一批专门从事刻书的工匠，他们有些人当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兴起时，还投身其中，为太平天国镌刻刷书，后又随军转战两湖、占领南京，成为太平天国刻书机关——

镌刻衙的骨干力量。

广西的雕版印书只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西方近现代印刷机械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广西后，它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最终被铅印出版所取代。

一 官刻本

官方出资募请刻工、刻坊，或由官办书局刻印的书籍称作官刻本。在广西，宋代的官刻本有司库本、州军学本，明代有官署本、藩府本，清代有官署本、官办书院本和官书局本。

广西的官刻本始见于宋朝绍圣年间。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广南西路转运使司在桂州（今桂林）牒准奉圣旨开雕了王叔和的《脉经》十卷。这部被称之为“广西漕司本”的医书，是目前所知道的广西最早的一部雕版书，也是广西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官刻本。

建炎元年（1127年）宋王室南渡，迁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宋王朝迁都临安后，统治重心逐渐南移。广南西路作为当时南方较大的地方行政区域之一，得到进一步的开发，经济、文化与北宋时期相比也有所发展，作为文化活动之一的雕版印书，在广南西路当时的“帅府”——静江府（今桂林）以外的地方也相继出现了。据历史文献记载，从南宋绍兴年间开始，除广南西路所在地的静江府（今桂林）曾于淳熙三年（1176年）刊印了《范文正公尺牋》、《三家婚丧祭礼》等书外，柳州、容州（今容县）、象州，乃至富川等地的州署或州学也都先后刻了书。

绍兴四年（1134年）柳州州署在柳州创刊的《河东先生集》，是常同莅任柳州知州不久，为缅怀唐代曾任柳州刺史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而为其校刊的一部文集。这部文集尚待付梓，常同便奉调离开柳州，余下工作由继任者李褫亲自督办，很快得以完成。常同校刊此书，用功甚勤，因而质量较高。李褫

在《河东先生集后序》中就溢美常同说：“出旧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鸠良工，创刊此集。其编次首尾，门类后先，文理差舛，字画讹谬，无不毕理。”《河东先生集》刊行后，影响较大，带动了当时柳州对柳宗元的研究工作。绍兴五年（1135年）新任柳州知州文安礼编出了最早的一份柳宗元年谱——《柳先生年谱》，这份年谱很有实用价值，被历代不少出版家收入各种版本的《柳集》中。容州（今容县）官署于绍兴初年刊印的《本政书》十卷《比较》二卷，为宋朝贺州（今贺县）进士林勋所撰。书中列举北宋以来农耕与国防的弊政，力主借用古代井田制来治理国家，才能富国强兵。林勋的这些观点曾于建炎初上书皇帝，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读了该书，专门写了一篇名为《书林勋〈本政〉后》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介。

绍兴年间，分别在柳州、容州（今容县）官署刊印的这些书，都是很有份量的著作，它能产生于广西“帅府”之外的其它地方，说明广西刻书的整体能力已达到一定水平。此外，据《书林清话》记载，南宋时广西其它地方刻的书还有象州军州学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刊印的慕容彦逢《擒文堂集》十五卷，富川学官于端平二年（1235年）刊印的《诗传遗说》六卷，以及当时属荆湖南路，今属广西的全州军州学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和十四年（1187年）刊印的《集韵》十卷，全州郡斋陈虔英于庆元五年（1199年）刊印的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十卷等。

元代的广西，被蒙古族统治者划为南人地区，受到民族歧视和压迫，加上当时蒙古族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防范，制定著作需经本地官员进呈，报上级逐级批准后，方可刊行的条例，阻碍了文化的发展，故而元代广西的著述不多，印本更少。流传至今的一些所谓元代桂林官刻本，仅为片断抄存件，目前收藏在广西桂

林图书馆。

宋、元两朝，除上述可考知的 10 余种官刻本外，就是广西各地州、县曾编修过的 98 种地方志（含图经、图志、风土记）。这批方志从纂修到刻印，多由官署出资而为。可是其中镌刻了多少，因无完整传本，已难考知。唯有《宋史·艺文三·史类》著录的张维《广西郡邑图志》，以及乾道五年（1169 年）静江府学教授江文叔编纂付刊的《桂林志》，成为尚可考知的方志刊本。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桂林志》一卷，静江教授江文叔编。时乾道五年张维为帅，撰次疏略，刊刻草率，亦不分卷次。”从这段记载看，《桂林志》编撰、刻印的质量都不高。

明代广西的官刻本多是官署本，其中又以方志为多。从明代开始，全国修志之风渐盛，中央王朝屡次颁布修志条例，各地热心文化的地方官，也以修志为己任，并视修志的好坏，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之一。这一时期，广西由省至府、州、县等署衙，也纂修了不少地方志。据不完全统计，仅雕版印刷的就有 26 种，其中明景泰重刻的《桂林郡志》，是流传至今的广西最早的一部雕版书。它由桂林知府吴惠命工于景泰元年（1450 年）刊印完成，凡三十二卷。该书框高 21.5 厘米，广 13.7 厘米，每页 11 行，每行 21 或 22 字不等，字大行宽，字体圆润饱满，版心黑口，四周双边。全书纸张洁白，版式大方，疏朗悦目，写刻认真，镌法古拙，比较集中体现了明代广西雕版书的风格和版刻技艺所达到的水平。此外，迄今还存藏的明代广西地方志刻本，诸如“通志”有嘉靖十年（1531 年）刻《广西通志》六十卷，万历三十年（1602 年）刻《殿粤要纂》四卷，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刻《广西通志》四十二卷；“府志”有嘉靖十七年（1538 年）刻《南宁府志》十卷，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刻《南宁府志》十一卷，万历四年（1576 年）刻《太平府志》三卷，崇祯四年（1631）刻《梧州府志》二十卷，崇祯十年（1637 年）刻

《廉州府志》十四卷；“州志”有嘉靖十八年（1539年）刻《钦州志》九卷，万历十五年（1587年）刻《宾州志》十四卷。这些方志刊本，都是现存较为珍贵的明代广西雕版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它的印制方法与传统方法不同。传统印制书籍多用墨印，所谓白纸黑字，而这部书则是用靛青以代黑墨印在白棉纸上，成为独具特色的蓝印本。蓝印本为明朝人所独创，当时就能在广西出现，说明很不简单，广西的雕版印书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种蓝印本后来多被用作初印样本，便于用墨笔校正。明代广西的各级地方官署除刻印方志外，还刻印了不少经、史、子、集、医、农、杂著。明代周弘祖的《古今书刻》就著录了一些刻印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以前的这类书，如广西省布政司刻的《皇明理学名臣录》、《皇明名臣录》，按察司刻的《问刑条例》、《崇古文诀》、《武学经传》、桂林府刻的《曹邨传》；南宁府刻的《传习录》；以及廉州府（今合浦）刻的《安南图》等。流传至今的其它历史文献还记载了明代广西一些地方官员为兴教劝俗，以官署之资刊印先哲之书或自著本行世的情况。如嘉靖年间，广西提学使王宗沐为蒋冕刻的《湘皋集》三十三卷；万历十五年（1587年）桂林府署刊印的吴文华《粤西奏议》五卷；万历年间，临桂县署何太庚县令为张鸣凤刻的《桂胜》十六卷、《桂故》八卷，以及崇祯年间左州教谕兼太平学篆梁方图，为改当地陋习，刊印自著的《家礼四训约要》等。

以上所列举的明代广西官刻本，除方志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只有存目而无藏本了。如今还见藏于北京、上海、南京、浙江等地图书馆或藏书楼的明刻本，只有《广西乡试录》（弘治五年壬子科、正德二年丁卯科、正德八年癸酉科、正德十四年己卯科、嘉靖十六年丁酉科、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科、嘉靖四十年辛酉科、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隆庆四年庚午科、万历元年癸酉科、万历四年丙子科、万历七年己卯科、万历十年壬午科）的刻本十

三种，以及广西府江兵巡道刊印的医书《校增救急易方》二卷，万历十八年（1590年）广西临桂县署何太庚县令刻印的张鸣凤《桂胜》十六卷、《桂故》八卷等二三种。

明代广西的官刻本中还有一种被称作藩府本的。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政权，将其子孙分封于全国要地，谓之藩王，其府第便称为藩王府。诸藩富可敌国，藩王中又有不少博学之才，拥有十分丰富的藏书。他们这些人为了附庸风雅，多喜刻书以扬名，在当时还形成了一种风气。藩王府刻书是此前各代从未有过的。因其刻书有雄厚资金，又多以宋元以来的善本为校刊底本，故而藩府本往往校刊精审，用纸及印制均属上乘，数量也相当可观，成为明代印本的又一特色。

明代分封在广西的藩王有一家，为桂林靖江王朱守谦。他是朱元璋的从孙。朱守谦于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至清顺治七年（1650年）他的王室覆灭，历时280年，共传14代。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靖江王府曾以懋德堂的名号刻过书，但所刻之书均已流失不传，惟近代昌彼得先生的《明藩刻书考》尚记有其中三种书的存目而不致使明代广西藩府本寂然无考。如正德三年（1508年）第六代靖江王朱约麒刻的唐朝《陆宣公奏议》，嘉靖八年（1529年）第八代靖江王朱邦芑刻的《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三十卷和《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等三部。

有清一代，地方官吏藉官府之力刻印的书，无论是从种类还是数量来说，都已大大超过了前代。据现存清代刻本及公私藏书目录考证，清代在桂林的官署衙门，诸如巡抚署、节署、漕署、使廨、官廨，以及桂林之外的府、州、县署衙及官办书院等机关，都刻了不少经、史、子、集和杂著之类的书籍。同时，省三司及各府、州、县等官署纂修、刻印的地方志，为数也不少。清代的方志，体例日趋完善，内容更加丰富，反映的领域也愈益广泛。这一时期雕版印刷的各级各类方志，现还存目的为116种，

存书的尚有 106 种。其中，广西巡抚谢启昆于嘉庆六年（1801 年）聘请湖南零陵刻工雕版印制的嘉庆《广西通志》二百七十九卷首一卷，曾被清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誉为省志楷模。该书不仅体例完善、内容丰富、校刊精审，就是镌刻也相当精湛。湖南零陵地区自古多技艺精良的刻工，雕版印刷工艺代代相传，清代来到桂林刻书的又不乏其人，因而他们镌刻的书往往代表了当时广西雕版印书技艺的最高水平。此外，省署衙门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刻的《广西通志》四十卷，雍正十一年（1733 年）刻的《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以及各级府、州官署分别于乾隆八年（1743 年）刻的《南宁府志》五十六卷，雍正四年（1726 年）刻的《太平府志》五十卷，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刻的《柳州府志》四十卷首一卷，嘉庆十年（1805 年）刻的《平乐府志》四十卷首一卷，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刻的《梧州府志》二十四卷首一卷，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刻的《浔州府志》五十卷首一卷，道光六年（1826 年）刻的《浔州府志》七十六卷首一卷，同治十三年（1874 年）刻的《浔州府志》三十八卷首一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刻的《浔州府志》五十七卷，康熙十二年（1673 年）刻的《廉州府志》十四卷，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刻的《廉州府志》二十卷首一卷，道光十三年（1833 年）刻的《廉州府志》二十六卷首一卷，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刻的《镇安府志》二十五卷首一卷，乾隆二十年（1755 年）刻的《庆远府志》十卷，道光九年（1829 年）刻的《庆远府志》二十卷首一卷等地方志，都是版刻较好，能反映清代各不同历史时期广西各地雕版印刷水平的官刻本。

清代每届会试、乡试之后，桂林各书院的主要讲席常聚会提学督署等处，对本地士子的试卷作评点，然后将卷评编选成册，经广西督学使者鉴定，再由督学等衙署出资请工匠或交付广西各大书坊雕版印制。这些主讲聚会的地方或叫提风阁，或称衡鉴

堂，因而这些版刻成册的试卷，或署名衡鉴堂刻，或署名提风阁藏板。流传至今的这类版刻卷子，有道光十二年（1832年）广西督学使者钱福昌和同治六年（1867年）广西督学使者孙钦昂鉴定的《广西试牍》二种，道光、咸丰、光绪年间的《广西闹墨》多卷，以及《广西道光同治光绪历科会试朱卷》、《广西乡试朱卷》等数十册。这些册子纸质洁白，墨迹清晰，有的还是套色雕版，印有朱墨双色。

除方志、试卷一类的官刻本外，经、史、子、集以及杂著等官刻本也不少。这些书清代晚期刻的又较中、初期刻的为多。清代中、初期的广西官刻本，现在还可见到最早的要数嘉庆六年（1801年）广西巡抚署以铜鼓亭名义刻印的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十五卷。铜鼓亭是建于广西巡抚署衙院内东南隅的一处凉亭，嘉庆五年（1800年）巡抚谢启昆将前任巡抚金铁所得的一尊铜鼓置于其中，故取名铜鼓亭。其次，道光四年（1824年）钮大炜在广西刊印的《名法指掌新例增订》四卷，道光七年（1827年）桂林使廨刊印的叶绍本《白鹤山房诗钞》二十卷、《词钞》二卷、《外集》二卷。道光十四年（1834年）广西督学使者池生春交付桂林钱文元堂刻印刷的《小学》四卷，翌年池生春又以粤西节署芝草堂的名义刻刷的《塾规二十四条》。芝草堂，在广西提督学署衙院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广西督学王如辰在桂林府治北建提学督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有灵芝生于署之西堂，当时广西学政朱佩莲作《芝草堂记》，故而得名。道光二十年（1840年）桂林署斋刊印了时任广西巡抚梁章钜辑的《楹联丛话》十二卷附《续话》四卷，大约也就在这段时间前后，梁章钜还交付位于桂林省城十字大街上的汤日新堂刻刷了《三管英灵集》五十七卷。该书是梁章钜感于前广西学政池生春汇辑广西历代文人诗文未成，从而命广西各府、州、县采送乡邦人士诗文集，又益以说部、丛书、石刻、地方志等资料，

组织人员选辑而成。具体参加选辑与校订者为当时广西名士平南人彭昱尧、临桂人朱琦。该书将上起唐宋，下至当时，凡已故广西文人传世之诗皆选录，并注明其里居事迹，此外还兼收闺秀、方外、流寓之诗，共收有 567 人的诗 3551 首，是一部大型的广西古代诗歌总集。此书刻工颇佳，可见当年桂林之刻书水平与人文之盛。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粤西节署重刊的彭希涑辑《二十二史感应录》二卷，同年，桂林官廨刊印的郑祖琛《小谷口纪事画引》；到了咸同年间，又有咸丰五年（1855 年）桂林府弟子重刊的《返性图》，同治五年（1866 年）广西布政使苏凤文校刊的《广西全省地輿图说》四册，同治六年（1867 年）广西学署芝草堂竹深荷净斋刊印的《草字纪摘要》，同治九年（1870 年）粤西漕署刊印的刘楚英《石龕诗》二十一卷，以及同治七年（1868 年）广西巡抚张凯嵩辑刊的《杉湖十子诗钞》二十二卷。该书为张凯嵩感于清代乾嘉以后广西人文日盛，但遗书经乱后，或存或亡，亟待整理辑刊，以传永远，因就其所录存的当时广西重要文人及寄籍或流寓于桂林的外省文人之常聚会于桂林杉湖者之诗，加以选辑刊印而成。此书计收入临桂汪运《剑峰诗钞》一卷、山阴杨继荣《柳塘诗钞》一卷、临桂商书濬《麓原诗钞》一卷、平乐曾克敬《芷潭诗钞》一卷、桂林朱琦《伯韩诗钞》五卷、临桂龙启瑞《翰臣诗钞》二卷、平南彭昱尧《子穆诗钞》三卷、临州李宗瀛《小庐诗钞》五卷、南丰赵德湘《澹仙诗钞》二卷、汉阳黄锡祖《香圃诗钞》一卷，共 10 种。

以上所提及的经、史、子、集类的广西官刻本，均为清代中、初期在桂林一处雕版刻印的。除此而外，广西各地方衙署及官办书院，在这一时期，也有此类的官刻本，如浔州（今桂平）郡署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刊印的陆我嵩《无成录》，平南县武城书院于道光十八年（1838 年）秋刊印的《书经精义汇钞》、《诗经精义》等，只是数量极有限。

到了清代晚期，也就是光绪以后，广西官刻本的数量较之中、初期有明显增多，刻书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流传下来的广西官刻本看，有广西使署张联桂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刻印的《覃节妇诗》，还有光绪三年（1877年）梧州郡署刊印的徐延旭《越南辑略》二卷，该书为徐延旭根据其两次出使越南之所见所闻及所得资料辑纂而成。还有光绪九年（1883年）柳州提署刊印的方德骥《军牍汇存》四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梧州西税总局刻印的《盾墨留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兴业县（今玉林）学交付玉林杨云锦楼刻印的米瑞光教谕的《训蒙五伦编》，以及光绪七年（1881年）宜山县署段荣棣县令为宜山陈丰玉刊行的《地学理气精传》。就连广西一些偏远的衙署除刻印地方志外，也刻印了经、史、子、集类的书籍，有的还是丛书。如奉议州（今田阳）官廨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刻印的《昆明华氏丛刻》八卷，此书计有《山馆偶存》一卷、《山馆学规》一卷、《蒲江县练团规约》一卷、《味鲜集试帖》二卷《附集唐人句》一卷、《勿自弃轩遗稿》一卷、《行我法轩二十四孝试帖》一卷等6种；太平思顺兵备道（道治在今龙州）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印的蔡希邠《寓真轩诗抄》十二卷等。

清代晚期，广西还办起了官书局，有计划地雕版印刷了一批儒学典籍和地方历史文献，对广西的文化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

光绪十四年（1888年）前后，在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纷纷设置官书局的形势下，当时广西巡抚沈秉成与布政使马丕瑤亦着手在广西筹设书局，刊印图书。然而不久因沈秉成调往安徽任职，办书局之事只好暂时搁下。书局虽未来得及建立，但在这段时间里，广西抚署还是组织力量校刊了一批广西历史文献，以弥补嘉庆《广西通志》出版后近90年间，因社会动荡，图书文献损失巨大而又无力重修《广西通志》之不足。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广西抚署交付桂林唐九如堂开雕的这批书包括道光年间

苏宗经辑、光绪年间羊复礼增辑的《广西通志辑要》十五卷首一卷，以及反映道咸以后广西社会政治状况由数任广西巡抚苏凤文、刘长佑、张凯嵩分别辑撰的《广西昭忠录》八卷、《平桂纪略》四卷、《股匪总录》三卷、《堂匪总录》十二卷、《广西道里表》一卷。唐九如堂刻刷的这批书都是首次雕版，写刻精细，书品大方、笔疏字朗，用纸优良，较当时一般的坊刻本精美。

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西通志辑要》十五卷首一卷刊刻完竣未及刷印，升任广西巡抚不久的马丕瑶即命桂林知府夏敬颐稽之档册，对该书重加厘订，又增辑“百色直隶厅”和“归顺直隶州”二卷，名曰《续刻广西通志辑要》附于十五卷首一卷的《广西通志辑要》之后，从而使《广西通志辑要》成为十七卷首一卷本传世。

马丕瑶任广西巡抚后，秉承前任沈秉成之意，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上奏《府厅州县拟设书局机坊折》，申请“拟在省城开一书局，刊六经读本，续刊实学诸书”。同年十一月初二，清廷正式批准了他的奏折。翌年春，马丕瑶即择址省城桂林秀峰书院西斋，创办桂垣书局（又称桂林书局），是为广西第一家官办书局。按马丕瑶的设想，书局既是一个征调图书，刊印善本，向广西各府、厅、州所设分局发售刊本的“出版发行机构”，又是一个兼具阅览和藏书功能的“图书馆”。它的结构布局为五间三进，有刻书处、读书堂和藏书楼。书局开设之初，由马丕瑶委赵蕩臣、黄兆怀二观察“董其役”，张璞完太守、黎彤蕴直牧“辅佐之”，负责征调存发刊印图书等事宜。光绪十八年（1892年）后，书局设置提调、总校、分校等职，分别负责局内事务及图书校勘事宜。曾先后在书局任过提调的有冯达夫、来熊、张薰、周劭本、吴征鳌、欧阳中鹄，任过总校的有龙小村、周黻卿、曹驯、石子轩、谢光绮，任过分校的有周嵩年、祁永膺、宾光华、李钦、莫永成等。书局开设后即选择一批由江苏、浙江、广东、

湖南、湖北等省书局寄赠来的经史子集和“实学诸书”，有计划地分类缮刻刷印。承担刻刷的有书局募请的写、刻工，也有当时在桂林很有名气的刻书坊——蒋存远堂。书局的经费取自道库，每月仅有银子 28 两作为局员薪水及工役伙食，刻书之款只能边刊边筹，经费拮据，这既影响刻书的进度，也限制了刻书的品种，原打算刻印的“实学诸书”，后来只刻出一二种。光绪三十年（1904 年）书局刻书经费匮乏，难以维持之际，幸得当时广西巡抚柯逢时的支持，拨银二万两生息刻书，书局才未垮掉。今据历史文献及广西各大图书馆馆藏书目统计，桂垣书局在光绪十六年（1890 年）至三十二年（1906 年）这短短的十六七年时间里，刻印的图书有 30 种左右，如光绪十六年（1890 年）刊出的《诗经》八卷、《书经》六卷、《周易》四卷、《礼记》十卷、《广西存书目录》一卷，及其《孝经》、《小学集解》、《图民录》等。其中《图民录》被马丕瑶视为“敷陈治理，深切著明，为居官宝鉴”的典籍，曾发给“任地方者人手一篇”。光绪十七年（1891 年）刊出的《蚕桑实济》四卷，《圣祖仁皇帝廷训格言》一卷、《澹香斋咏史诗》一卷、《尚书因文》八卷、《（光绪）迁江县志》十卷，以及奉旨刊发的《御制劝善要言》和补刊的《（嘉庆）广西通志》二百七十九卷首一卷等。光绪十八年（1892 年）刊出的《在官法戒录》四卷和重刊的《（嘉庆）临桂县志》三十二卷，光绪二十年（1894 年）刊出的《桂海文澜集》六卷，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刊出的《檀弓解》一卷、《桂海文澜二集》六卷、《灵芝益寿草》（《慎疾刍言》一卷和《世补斋不谢方》一卷）、《粤西笔述》，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刊出的《续富国策》四卷、《近思录附考朱子世家》十四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刊出的《劝学篇》二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刊出的《阳明先生集要三篇》十六卷等。这些书籍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流传下来的还有 20 余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广西巡抚林绍年、提学使李翰芬，在桂林老提圻街陈文恭公祠办起广西官书局，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购进各种新式教科书。第二年新任广西巡抚张鸣岐又购置铅字排印机和石印新机，开始采用近代印刷技术，承印和发行政府官厅文件、书报杂志和学堂教科书，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印刷局。从此以后，官办的桂垣书局的雕版印书业被取而代之，广西官府印书再也不用雕版，而都改用机器印刷了。桂垣书局此时只被当作藏书与借阅之所，直到民国二年（1913年）广西省立图书馆成立，它的全部图书移交给图书馆后，其历史使命也就最终完结了。

二 坊刻本

坊刻本是指书商开设的书坊、书铺或书店雕版印制的图书。书商经营刻印的图书大多是一些市面畅销，可以赚钱的书，故而刻书内容涉及的范围一般比较广，种类也相当繁杂。诸如民间历书、通书、名班戏文、通俗唱本、占卜星相书以及《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蒙童读物和民间医案、验方等实用医药书籍，刻得较多。在广西，一些规模大而有名气的书坊，还经常承担官府交付刻印的经史子集和历年（科）的乡试朱卷、优贡卷，从中受益，获得发展。

广西的坊刻本从雕版书在广西流传分布的情况及广西官刻本的发展历史看，应该说从宋代起就已出现了，但宋、元、明三代至今没有一本坊刻本流传下来，也未见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文字记载，故今已难觅这三代广西坊刻本的史实了。

清代广西坊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少，这时书坊刻印的书籍一般在前页或尾页都署有坊（铺）名，从这些署名中，可以看出当时广西的桂林、全州、灌阳、柳州、梧州、贺县、玉林、容县、博白和宾州（今宾阳）等地都开设了专门从事雕版印书的书坊，其